

三十年來美俄關係的檢討

施 岳

美國為了維持現狀，力求與蘇俄和解，而和解並非單方面的事，結果是在那裏緣木求魚，永遠落空。而蘇俄一直是「假」和解，「真」對抗，也就是以和解為幌子，來「鬪臭」（藉情報戰、心理戰、宣傳戰，使美國蒙上「霸權」、「超帝」的臭名，打擊美國的聲望，離間「第三世界」，甚至西歐民主國家及日本跟美國的關係）、「鬪垮」（用「和平」或「非和平」手段，將美國「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美國。

壹

美國一向誤認所謂「和平共存」，是領土現狀與體制現狀的承認，妄想可以由此進而達到停止軍備競賽，促進共產國家與民主國家經濟上的往來，文化交流——特別是思想上的自由交流，而使兩種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之人民相互認識，進而瞭解和尊敬，如是再也不會因對抗而發生流血的衝突與戰爭。像美國這樣一個得天獨厚、富庶、民主而且似乎很安全的國家，往往從自己的角度，去衡量其他國家，特別是敵對的國家，結果就低估了蘇俄。

現在我們必須指出，根據歷史的見證，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迄今，美俄關係，對抗是「常」，而和解是「變」，茲列舉若干具體的對抗史實，以證明上項看法。據統計，由一九四五—六〇年代末期，美、俄部份或間接參加的戰鬥行為，計有下列各事件：（一）一九四五—四九年的希臘內戰；（二）一九四五—四六年的伊朗反共戰爭；（三）一九五〇—五三年的韓戰；（四）一九六三—六六年的馬來西亞與印尼之爭；（五）一九四八年迄今的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爭；（六）一九五九—六二年的寮國問題（已完全淪陷）；（七）一九六二—六三年的中（共）印邊境衝突等。此外，美、俄未曾直接介入，僅從事針鋒相對鬪爭的事件：（一）一九四八年的共黨所導演

之捷克政變；(一)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抗暴事件；(二)一九四八年迄今的印巴糾紛；(三)一九五四—六二年的阿爾及利亞之獨立運動；(四)一九六〇—六四年的剛果卡坦加省之獨立事件；(五)一九六二—六五年的葉門內戰；(六)一九六七年的奈及利亞 Biafra 省之獨立事件；(七)一九六八年的蘇俄及東歐四國武裝干涉捷克事件；(八)一九六九年的宏都拉斯與薩爾瓦多邊境之爭等。

雙方另一項明顯的「對抗」，表現於他們與彼此有關各國所簽訂安全或防衛條約的行為上，從一九四五—六〇年間，美國與世界各國所簽訂之主要防衛條約如下：(一)一九四五年，簽署「聯合國憲章」；(二)一九四七年，南美事件後簽訂「里奧公約」；(三)一九四八年，與南美洲國家成立「美洲國家組織」；(四)一九五〇年，簽訂「北大西洋公約」；(五)一九五一年，簽訂「美、菲共同防衛條約」；(六)一九五一年，簽訂「美、日共同防衛條約」；(七)一九五三年，簽訂「美、韓共同防衛條約」；(八)一九五四年，簽訂「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已被美方片面撕毀)；(九)一九五四年，簽訂「東南亞公約」(「東約組織」已解散，現另組「東南亞國家協會」)；(十)一九五七年，宣佈「艾森豪主義」，主張「促進中東和平和以色列建國」；(十一)一九五九年，分別與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簽訂雙邊「協防條約」。以上為美國在全球戰略需求下，與世界各國所簽訂的主要防衛性條約。自一九五六—六九年間，和美國簽訂協防條約，並接受軍、經援助者，計有二十多個國家。當此同時，蘇俄亦與世界廿多個國家簽訂「友好互助條約」(實際亦係協防條約)。在美、俄與世界各國簽訂雙邊或多邊，以及各類不同性質條約的同時，也構成美、俄兩國在全球各地進行戰略競爭的網狀對抗。

蘇俄實際上對「和平共存」的運用，以及其所求達到的目標，則決不是美國一般人所能想像和理解的。蘇俄與美國分別具有兩種大不相同的社會制度(共黨稱之為「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因此，兩國在意識形態及國家利益上亦完全迥異。季辛吉在其擔任國務卿時，於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九日向美參院外交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中，即曾明白指出美、俄兩國間的上項巨大差異為：(一)深植於歷史及兩國發展的方式之中；(二)由互相衝突的價值與彼此對立的思想所助長；(三)表現於不同的國家利益，而產生政治及經濟競爭；(四)受到盟國和友邦的影響，美國珍視彼等的友誼，也決不能犧牲彼等的利益^①。若不瞭解這些差異，對其加以重視與研究，就會低估蘇俄的挑戰，定給美國帶來嚴重的危險及無窮的災禍。

蘇俄為達其「世界革命」的幻想，實現全球實行共產主義的最後勝利之目標，其先決條件，必須設法不斷削弱美國的威望、影響及力量，並選擇最有利的時機，一舉而將美國擊潰。美國「當前委員會」^②，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四日以「蘇俄的企圖何在？」為題所發表的報告中，即曾指出蘇俄外交政策的下列四項中程目標：(一)加緊實現現代化的構想，來強化蘇俄的經濟，並以此作

註① Lester A. Sobel, *Kissinger & Detente* (New York: Facion File Inc., 1975) pp. 9-10.

註② 美國「當前委員會」，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成立的，由一百四十一名極有名望的美國公民發跡成立，其中包括不少前美國政府的高級官員。此一委員會的任務，主要係對當前的戰略、政策以及美俄關係等問題，進行研究。

為提高蘇俄軍力的基本前提，這一目標的一部份，是靠從獲得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引進大量資本及技術來實現，一部份則是靠加速共黨國家的經濟整體化來實現。因此，希望得到大量的外國資本、貸款及技術的協助，這就是為什麼蘇俄領導階層對西方強調「緩和」緊張形勢的一個重要因素。(二)擴大並加強蘇俄及其附庸國家和西歐各國的聯繫，同時分化西歐與美國的關係。(三)切斷「資本主義世界」，特別是美國跟「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交往；因為蘇俄認為工業化的民主國家，如若無法獲得「第三世界」國家所擁有的原料，勞動力及市場，就會陷入一系列之致命的動盪不安局勢。(四)圍堵並孤立中共。以上這四項中程目標，也就是蘇俄「和平共存」構想的主要內容。雖然完成這些目標，主要的有賴使用和平方式之經濟及政治手段，但在蘇俄的戰略中，唯一最重要的手段，則是軍事實力。

誠然，蘇俄目前在生產能力及武器技術方面，都比美國稍微落後，但是任何人都不能保證，美國在這些方面永遠領先，或領先地位能夠維持多久，況且蘇俄可用其他方面的優勢，來彌補其缺點。蘇俄領導階層，也不像美國民主制度那樣，一切作為，受到立法方面及反對者不同意見的限制，更不會受到輿論的攻擊，指責其將國家財力用於軍事的不當（事實上，蘇俄祇有官方御用的宣傳機器，而無真正代表民意的輿論），蘇俄政府當局却能肆無忌憚隨心所欲，將其有限力量集中使用，來達成其各個目標。

顯然美國所擔心者，倘使蘇俄一旦在戰略武器和傳統武器方面取得優勢以後，蘇俄就能在國際性或地區性的衝突中，對美施加決定性的壓力。屆時蘇俄就可輕易地迫使美國退却或屈服，一如在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事件中，蘇俄被迫退却的情形一樣。當美前總統尼克森為其部署反彈道飛彈（ABM）的決定而作辯護時，他曾經這樣表示：「我不願意看到一位美國總統將來在任何危機發生時，發現他的外交信用，因為美國居於第二等或劣勢的地位而受到重大的損害。我們曾看到此種事實，對蘇俄在古巴飛彈危機時的意義是怎樣的？當時就是因為他們居於劣勢」^③。時間還不到十年，尼克森所提出的警告，不幸而正威脅着卡特政府。不僅在陸軍方面的傳統軍事力量，蘇俄已遠超過美國，而最可怕的是，關於戰略武器方面，蘇俄業已領先美國。

本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上有一篇專題報導^④，其內容是美、俄軍力（包括傳統武器以及戰略武器）的比較，看過後真叫人不寒而慄。美國國防部長勃朗在一九八〇年元月廿九日提交國會的報告中，提到蘇俄擴建其陸軍傳統軍力如下：(一)坦克——從一九六四年的三萬輛，增至一九八〇年的四萬五千輛，計增加一萬五千輛。(二)師——從一四五師增至一七〇師，增加了廿五師。(三)大砲與火箭發射器——從一萬一千門增至兩萬門，幾乎增加一倍。(四)攻擊性戰機——從三千五百架增至四千五百架。(五)軍隊人數——從一九六四年的三百四十萬，增至目前的四百四十萬，增加約一百萬人。美國在同一時間所增加的為：(一)坦克——一萬二千輛；(二)師——十九師；(三)戰術飛機——五千零八架。

註③ 鈕先鍾譯：「戰略力量與國家安全」（臺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國六二年），第十八頁。

註④ "How Strong Is Russia?" *U. S. News & World Report*, Feb. 11, 1980, Vol. 88, No. 2, pp. 17-21.

這篇報導，曾將美、俄軍力，作過比較，先後陸軍傳統軍力方面，蘇俄已遠超過美國。就人員來說，從一九七〇年以後，美國軍隊從三百一十萬裁減至二百一十萬，共減少了一百萬；但在同一期間內，蘇俄適得其反，其軍隊却增加了四十萬，目前估計有四百四十萬，比美國多了一倍有餘。至於傳統武器方面，美、俄最近三年此項武器平均年產量如下表。

傳統武器平均年產量（一九七七—一九七九年）比較表

武器類別	國別	
	美	俄
坦 克	六五〇輛	二、〇〇〇輛
戰 鬥 機	二七五架	五〇〇架
直 升 機	一五〇架	三五〇架
戰 鬥 車 輛	一、〇〇〇輛	五、〇〇〇輛

如表所示，在一九七七—一九七九年間，蘇俄的坦克產量以二、〇〇〇輛比六五〇輛領先美國（三倍弱），戰鬥機為五〇〇架比二七五架（一倍弱），直升機為三五〇架比一五〇架（一倍強），其他戰鬥車輛為五、〇〇〇輛比一、〇〇〇輛（五倍）。

蘇俄的海軍力量，在過去十年內的擴張相當驚人，僅在一九七〇—七五年間，蘇俄每年平均增加四十艘軍艦和七艘潛艇；而美國每年祇增加七艘軍艦和不到一艘潛艇。另據勃朗提交國會的報告中說：「一九六四—八〇年間，蘇俄的軍艦與兩棲船艇從二六〇艘增至三六〇艘，海軍船隻總噸數從二百萬噸增至二百八十萬噸。美、俄現有海軍力量的比較，如下表所列。

美、俄現有海軍力量比較表

船隻類別	國別	
	美	俄
航 空 母 艦	一三艘	二艘
海 面 軍 艦 與 兩 棲 船 隻	一三四艘	三六〇艘
核 子 潛 艇	七五艘	八六艘

從上表我們獲知，蘇俄除航空母艦遠較落後於美國外，其他如海面軍艦與兩棲船隻，以及核子潛艇，現均已領先美國。順便談談蘇俄的軍事運輸能力情形。蘇俄的軍運能力，過去十年來亦突飛猛進。它現有的海上與空中運輸工具（以往數量微乎其微），使其軍事力量幾乎能伸展到全球的任何角落。

關於戰略武器方面，我們也不妨將雙方擁有者，從一九六二年迄今作一比較。一九六二年時，雙方差距最大，美國比蘇俄多達十倍，一九六五年減為四倍，一九六八年再減為兩倍，目前（不到兩年）蘇俄已領先美國。拿一九六四年為例，當時，美國在州際彈道飛彈方面以四比一的優勢領先蘇俄。其潛艇發射的彈道飛彈，為蘇俄的十倍，其長程轟炸機為蘇俄的七倍，其核子彈頭，更比蘇俄多達十六倍。目前的真實情況是，蘇俄在洲際彈道飛彈和潛艇彈道飛彈方面，已經領先美國；而美國在長程轟炸機方面的領先，已減少至三四八架比一五六架，美國核子彈頭的優勢，亦已減少至九、二〇〇枚比六、〇〇〇枚。

最後，再將美、俄兩國國防預算作一比較，或可有助於解答：為什麼蘇俄的軍事力量有如此迅速而可怕之驚人發展。根據美中央情報局的研究，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九年間，蘇俄國防經費總額，每年平均比美國多出百分之三〇。以一九七九年為例，蘇俄國防經費為一千六百五十億美元，即比美國的國防經費一千零八億美元，多出了百分之五〇強。一位西歐分析家估計，蘇俄各類產品用於軍事方面者：計機械產品為三分之一，冶金產品為五分之一，化學產品為六分之一。如嚴格地將以上各項費用，均列入軍事經費項目中，這項國防經費數字，龐大得更為驚人。

貳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本希望與俄合作，重建國際安全和秩序，蘇俄却用戰後對其極為有利的條件，向東、西兩方面大肆擴張，特別是向歐洲，不久東歐各國先後盡淪為其附庸。一九四七年蘇俄繼續向希臘及土耳其推進，直逼巴爾幹與地中海，美國為本身安全計，迫不得已而放棄其傳統的孤立主義，謀求遏阻蘇俄的擴張政策。蘇俄勢力之急劇擴張，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已引起西歐民主國家的注視。是年，英首相邱吉爾首先提出東歐已關進「鐵幕」的警告。當美國政府的態度轉趨堅定後，於是杜魯門總統接受了美駐俄大使肯楠的建議，對蘇俄採取「圍堵政策」，認為將俄圍堵起來，以俄本身先天的缺點，預計在十至十五年之後，必然自行崩潰。杜魯門乃向國會發表咨文指出：「美國國策，必須支持各自由民族抗拒少數武裝份子或外來壓力的征服」^⑤。要

註⑤ Arthur M. Schlesinger, *Dynamic of World Power,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 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 1973) Vol. 2, p. 312.

求國會支援土、希兩國，以抵抗蘇俄的侵略。為世人所知的「杜魯門主義」(The Truman Doctrine)遂應運而生。「圍堵政策」係由三項重要措施所組成：(一)藉簽訂雙邊或多邊條約，建立一連串聯盟或安全體系；(二)普設軍事基地，以強大軍事力量圍堵蘇俄及其集團；(三)對於反共或非共國家(特別是西歐地區)，給予大量及足夠的經濟援助，培養這些國家的國力，俾以抵抗共黨的侵略(包括國內或外來的)。關於第三項措施，美國爲了協助歐洲盟國恢復與發展其經濟，來保障其安全，曾由國務卿馬歇爾於一九四七年六月間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說，主張以大規模財政援助，給予西歐各民主國家，藉以穩定各國戰後的破碎經濟，進而使其實力充實，以抵禦共產主義的蔓延。「馬歇爾計劃」是在一九四八年經美國會通過後開始施行，從一九四八—五一年四年時間內，在這項援助計劃下提供歐洲各國經濟復興的款項，計高達一二〇億美元^⑥，致使蘇俄在歐洲進一步擴張的妄想幻滅。

一九四八—四九年蘇俄封鎖柏林失敗後，促使美國更加強化其在歐洲的立場。經過數度協商，如是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正式成立。其後，蘇俄於一九五五年五月亦組成「華沙公約組織」，以資對抗。同年(一九五五)西德成爲主權國家後，蘇俄爲了報復民主國家而承認東德的獨立，並進而築成柏林圍牆。於是因冷戰僵局而產生的「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遂成爲美國對抗蘇俄所採用的三項主要法寶。此外，美國還協助建立「中部公約組織」及「東南亞公約組織」，並在韓戰爆發以後，先後與亞洲太平洋國家中的韓國、日本、中華民國、菲律賓、澳洲和紐西蘭等簽訂雙邊及多邊條約，組成美國全球性的「圍堵蘇俄」戰略體系。同時，美國並在文化、經濟、思想等方面加強與自由國家的關係，藉以阻止共產主義細菌的感染，故這種對抗被稱之爲「冷戰」。「冷戰」時期的特點是美、俄兩大集團壁壘分明，以致形成「兩極政治」。對地區性的危機，美國以其絕對優勢的兵力採取「戰爭邊緣政策」以及「大力報復政策」，來嚇阻或擊退蘇俄和其附庸的冒險，此一情勢大致維持了將近廿年(一九四七—六七年)。

艾森豪當選美總統後，朝野均寄以厚望。他被公認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盟國戰勝德國的英雄人物，爲全國所景仰，爲國會所尊敬。在此極有利的條件下，他也試圖有所作爲，並得反共政治家杜勒斯擔任國務卿，立即採取「戰爭邊緣政策」，且以「解放鐵幕」相號召，對蘇俄確實產生了嚇阻效果。在其任內有下列主要措施：(一)不斷以C-54飛機偵察蘇俄及中國大陸地區(偵察中國大陸之飛機，以臺灣爲其主要基地)，使蘇俄與中共均無法蠢動。(二)一九五八年中東危機發生時，艾森豪總統當機立斷，毅然下令美軍在黎巴嫩登陸，阻止了事件之擴大，使蘇俄不能興風作浪。(三)艾森豪總統親自訪問中華民國，他並在金門炮戰後期以後勤支援我國。但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爆發後，美國未能趁此有利時機，動員盟邦予以大力支持，致使其「解放鐵幕」之號召，徒托空言。而在另一方面，一九五九年一月至六月，却有蘇俄部長會議兩位第一副主席米高揚與柯茲洛夫先後訪問美

註⑥ 李邁先「俄國史」下卷第六〇頁(正中書局，民六三年)。

國，並主持在紐約舉行的「蘇聯科學、技術及文化展覽會」。自俄外長莫洛托夫於一九四五年至舊金山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以來，此為蘇俄高階層人員首次訪美。同年七月，美副總統尼克森訪俄答聘，並順便主持美在俄舉行的展覽會。這幾次美、俄雙方副元首級的互訪，旨在為更高層的元首級會談鋪路。一九五九年九月，赫魯雪夫接受了美總統的邀請，率團訪美，雙方在大衛營舉行「面對面的親切會談」。赫魯雪夫於離美前發表的聲明中，極力讚揚艾森豪總統對於避免戰爭、爭取和平的真誠意願，稱之為比美「日內瓦精神」的「大衛營精神」⑦。

甘迺迪係一富庶豪門出身的子弟，一九六一年競選總統成功後，由於其原對共產主義侵略的本質認識不清，竟輕率地將美國對共產集團政策，作大幅度的改變。在此時期中，美國對蘇俄與中共政策，雖仍以圍堵為原則，但已不再堅持使之孤立，並盡可能跟他們保持接觸。例如對中共採取「搭橋」措施，逐步放寬禁運及旅行觀光等限制，嚴格說來，甘迺迪是與中共進行勾搭的第一位美國總統。另外對於蘇俄則裝置熱線，以避免誤解而引起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俄時思將共產主義運動在拉丁美洲尋找一處發展的據點，迄無結果。當瓜地馬拉及委內瑞拉發生動亂時，蘇俄即乘機滲透，但未成功。一九五九年元旦，古巴發生政變，卡斯楚推翻巴狄斯達總統，繼掌政權，以實行民主革命為號召，沒收美國在古境資產，並標榜反美親共。靜觀一年後，蘇俄對古巴的活動，自一九六〇年開始積極進行支援。是年二月，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首先訪問哈瓦那，與古巴簽訂「貿易協定」，並貸予美金一億元。迨六月時，赫魯雪夫曾親往古巴訪問，其後不久，即在莫斯科簽訂以古巴食糖交換蘇俄石油的協定。一九六二年夏，古巴國防部長羅爾·卡斯楚訪俄，允俄在古境內建立飛彈及潛艇基地。嗣後，大批蘇俄技術專家即携同飛彈裝置，湧進古巴。其所建飛彈基地，最初僅為射程較短者，其後即有中程飛彈出現。此項基地一旦建造完成，美國大半領土均在其射程內，情況十分嚴重⑧。於是甘迺迪總統乃於十月廿三日簽署臨檢與封鎖的正式宣言，並以不惜一戰的態度，要求蘇俄撤除所有可能威脅美國的戰略性飛彈基地，以及攻擊性武器，同時並下令美國三軍進入備戰狀態。由於美國所採取的斷然措施，赫魯雪夫在幾經討價還價之後，終於不得不讓步及進行撤除工作，使一度將造成美、俄戰爭的「古巴」事件，得以和平解決。然而此一事件所造成的影響，可歸納為下列幾點：(一)證明當時蘇俄尚不足與美抗衡，因此提高了美國的威望，並減低了西方與中立國家對蘇俄的畏懼感。(二)在西歐國家對蘇俄恐懼消失的同時，亦對集體利益並不如以往重視，而祇集中注意各國自身的利益，無形中削弱了自由陣營的力量。(三)中共對赫魯雪夫的讓步甚表不滿，因此加深了雙方的歧見，此後不久，中共即與法國勾搭建交。(四)東西對立的局面，由於「古巴事件」使各國誤認世界局勢已趨和緩，蘇俄如是藉「和解」為掩護，得於全球各地乘機獲取利益。

註⑦ 同註⑥第八一六頁。

註⑧ 同註⑥。

甘迺迪被刺後，詹森繼任美國總統，蘇俄起初對其印象還不錯，蘇俄評論家認為他是「一個有經驗，非常謹慎，穩健的政治家」^⑨。美俄關係更由於下列事實得到增強(一)一九六四年，美國將大量小麥售予蘇俄。(二)同年四月美、英、俄三國協議停止生產核子分裂原料。(三)接着美、俄雙方於同年五月簽訂「美俄領事條約」，十月簽署「美俄氣象資料協定」，十一月雙方同意在海床使用原子能方面的技術合作。在蘇俄心目中，詹森總統第二任期內的表現就大不如前，因為他擴大越戰並下令轟炸北越。儘管如此，莫斯科方面仍認為詹森總統還是有意謀求美俄關係的改善。「詹森總統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的演說中，對於國際關係，力圖將越戰和其他重要國際問題，分別解決，並表示美國很想緩和歐洲的緊張局勢。他談到要改善東、西關係……美國政府已經簽訂紐約與莫斯科直飛航線的協定，廢除四百種物資輸往社會主義國家的限制」^⑩。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雪夫下台後，蘇俄新領導階層立即向美國保證：「要繼續執行共存與合作的關係，以「緩和緊張局勢」。接着詹森總統也在一九六五年元月四日的演講中，表示美國願與蘇俄及東歐促進彼此之間的相互瞭解和合作，並提出東、西「搭橋」的政策。但是這種和解氣氛很快就告消失，原因是美國對「北約」盟國的「核子多邊武力」(Multilateral Force M. L. F.)計劃，宣稱要讓西德擁有核子武器，蘇俄對於這一計劃，特別敏感，如是指責美國在鼓勵西德的「復仇主義」擴張。另一方面，美國在一九六五年二月開始轟炸北越，三月初美海軍陸戰隊於北越登陸，牽制北越的南侵。從此，蘇俄始嚴厲地攻擊美國破壞和平，要求美國從越南撤軍，並表示否則美俄關係必將進一步惡化^⑪。由於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不斷升高，致使蘇俄對美所提議促進東、西方諒解的建議，非常冷淡。從蘇俄對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詹森總統演說的反應，就可見其端倪。詹森在這篇演說中，再行力主「搭橋」政策，要求廢棄貿易壁壘，改善文化交流，盡可能相互裁減在歐洲的駐軍^⑫。布里茲涅夫於一週後就毫不客氣地拒絕了此項建議，他指出美國政府抱着「奇怪而固執的幻想」，完全不顧及越南的衝突，而妄想和蘇俄及東歐改善關係^⑬。蘇俄接着又指責「搭橋」政策的目的，是美國用來「顛覆社會主義政府，瓦解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⑭。在蘇俄心目中，對其建立起文化橋樑，即會導致它內部知識份子產

註⑨ W. W. Kulski, *The Soviet Union in World Affairs*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89.

註⑩ Albert L. Weeks, *The Other Side of Coexistence: An Analysi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2) p. 207.

註⑪ Thomas W. Wolfe, "Soviet Power and Europe 1964-1970",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70) p. 266.

註⑫ [紐約時報]，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

註⑬ 俄共[真理報]，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

註⑭ G. A. Arbatov,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1970's" Great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d., Norton A. Kaplan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74) p. 229.

生分離運動；而對東歐國家「搭橋」，最後必會摧毀蘇俄加於東歐國家的枷鎖。因此，「搭橋」政策對克里姆林宮的威脅，似乎要遠較「冷戰」、「圍堵政策」更大、更危險。

美國在五十年代的「大力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 戰略構想，最初是靠其核子壟斷，以後又靠其壓倒性核子優勢，來嚇阻蘇俄及共產集團對民主國家的威脅，但是「大力報復」使美國祇能有兩種選擇——為發動核子戰爭，否則就祇有妥協與退却。因此，國際共黨在五十年代發動了許多區域性的有限戰爭，美國對之亦無可如何。為了應付各種不同層次的戰爭，詹森總統繼續保留甘迺迪政府「彈性反應」(Flexible Response) 的戰略構想。此一戰略構想，係泰勒將軍在一九五五年任陸軍參謀長時提出的，他解釋道：「我現在建議用『彈性反應』的戰略，來代替『大力報復』的構想。這種戰略是表示必須具備有應付一切挑戰的能力：從全面核子戰爭以至滲透……這個戰略認為嚇阻或迅速贏得一次有限戰爭，就像嚇阻全面戰爭一樣重要，我們若不能迅速贏得有限戰爭，就會使我們陷於逐次消耗的困境，或是不斷地擴大而終於成爲大家想要避免的全面戰爭」^⑤。這種新戰略改善了「大力報復」運用不靈活的缺點，而強調應付各型戰爭可有各種選擇。但這種構想在當時遭到反對而擱置，直到泰勒將軍出任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時，美政府才採取「彈性反應」的戰略。這種戰略的主要內容爲：(一) 假定共黨作無限侵略時，則全面戰爭的報復兵力，應能對其造成「保證毀滅」——即遭受敵人一次攻擊後，尚保有足以摧毀敵人的力量。(二) 在核子傘掩護下，美國的軍力應保持「兩個半戰爭的戰略」(2½ War Strategy) 力量，即是維持一種力量，同時對抗在歐洲及東方兩個主要挑戰，而還能保有充分的預備隊，足以在任何地區撲滅一個小規模的野心蠢動。(三) 美國承認有壓制革命的必要，集體安全的安排繼續不變，雖然美國也負起「世界警察」的責任，但又強調對盟國的訓練計劃^⑥。這種戰略使美國的基本兵力增加，國防預算亦隨之擴大，在詹森政府時，「彈性反應」開始變成一種不切實際的戰略，尤其當越戰繼續升高，美國愈陷愈深，其「彈性反應」戰略顯已瀕臨破產。

中南半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原爲法國殖民地，對美國可以說沒有任何利益可言。然而在短短的廿年中，中南半島却一變而成爲美國國家的重大利益，使美國最後居然派遣了五十萬大軍去參戰，並因此犧牲了五萬多青年子弟。據紐奇特蘭 (Donald E. Nuechterlein) 研究，中南半島在短短廿多年之內，其所以提升爲美國國家的重大利益，實緣美政府對其國家利益判斷錯誤之所致^⑦。戰後初期，多數美國人均認爲跟歐洲各國保持友好關係，才是美國的重大利益；但後來逐漸演變爲美國的利益，就是幫助非共國家不受外來或內部共黨勢力威脅的看法。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白宮發佈「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National Sec-

註⑤ 鈕先鍾譯：「大戰略」(臺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國六四年)，第二〇二頁。

註⑥ 同註⑤第一四三頁。

註⑦ Donald E. Nuechterlein, "U. S. Interests in a Changing World," (Kentucky: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67-168.

urity Action Memorandum)，標題為「美國在南越的目標」，說明了詹森總統對於美國在越南利益的觀點。該文件指出美國政策的目標，是要有一個獨立而不受共黨控制的南越：「我們不要求南越成爲西方的基地或西方聯盟的成員。但是，南越必須享有外來援助維持其安全和自由……除非我們能達成此一目標，否則整個東南亞都可能落入共黨手中」¹⁸。詹森之所以介入越戰，即是基於上項理由，因爲美國無法接受這種由於亞洲均勢發生變化所帶來的影響。詹森總統也認爲南越的失敗，將嚴重有損於美國的世界性信譽和聲望。他表示，「假使美國趕出越南戰場，則從此再不會有任何國家，信任美國的承諾或保護。美國必須站在越南不走」¹⁹。到一九六四年越南局勢危急時，武裝干涉遂被認爲是使美國避免嚴重外交挫折的唯一辦法。蘇俄在這場戰爭中，處於極爲有利的地位。它僅向北越提供軍、經援助，從旁注視越戰之進行。直至一九六五年二月，當柯錫金訪問河內時，美國首次對北越實施轟炸，才使局勢驟變。美對北越轟炸的結果之一，是莫斯科對河內的影響力增高，因爲祇有蘇俄才能提供精密的空防裝備。在越戰中，美國非常謹慎，絕不轟炸在海防港停泊的蘇俄船隻，或在海外佈雷阻止蘇俄的船運。而蘇俄也克制自己，不去威脅東京灣內的美國艦隊，或以新武器裝備交予北越，而威脅美方的空中活動。很顯然的，蘇俄是希望美國干預越戰的行動，能造成美國和中共直接對抗，如使美國陷在中南半島的泥沼中²⁰。由於越戰造成了美國巨大的財力負擔，使其經濟蒙受嚴重打擊，加之美國部隊士氣低落，國內羣衆不斷示威遊行，反戰情緒高漲，這一切終於迫使詹森總統不得不在一九六八年宣佈全面停止轟炸北越，並放棄競選連任。

蘇俄輿論界在一九六九年這一年中，在外表上一直對尼克森政府抱着友好和期待的態度。一九七〇年七月，刊登在莫斯科「國際生活」雜誌上的一篇題爲「政治宣告與眞實事實」的文章中，就表明蘇俄確信尼克森政府已採取積極行動，來改善美俄關係，但這篇文章也同時反映出蘇俄對尼克森政府的失望。該文章說：「在改善國際情勢及美俄關係的建設性成就中……尼克森政府已使核子武器及擴散條約生效。去年年底曾在赫爾辛基舉行預備會議，接着今年四月，開始在維也納進行美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並且隨時保持磋商其他問題。然而，對美國過去一年來外交政策的分析，我們仍認爲這些建設性的成就，並未解決所有的問題……尼克森『關島主義』的『越戰越南化』政策，並未改變美國在東南亞侵略政策的本質」。該文作者基明(A. Zimin)認爲儘管尼克森總統一再強調「談判代替對抗的時代」已來臨，可是事實上，美國政府仍對蘇俄採取「強硬立場」的政策。尼克森當選總統，美國國內外的局勢已和以前迥然不同，美國國內各方人士開始指責原有的外交政策不切實際。他們具體指出，美國大多

註¹⁸ "U. S. Order for Preparation for Some Retaliation Action," The Pentagon Papers, ed. Gerald Gold and Other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1) p. 283.

註¹⁹ 同註¹⁸第四〇三頁。

註²⁰ Adam B. Uiam, "Detente Under Soviet Eyes", *Foreign Policy*, No. 24 (Fall, 1976) p. 153.

數盟國均祇顧其本身利益，而使美國在物力與財力的擔負上，無法承當。他們批評英國不負責任地在東方和中東造成權力真空，譴責法國拒絕支援「北約組織」之不當。他們主張美國應放棄對盟國的一切承諾，而退回到美洲本土之內，這是一種新的「孤立主義」。而尼克森總統對於世界局勢却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他宣稱：「對一位總統而言，附和新孤立主義者以換取若干人望，那是太容易了。但是我要正告諸位，那是足以危害美國和世界的……所以我們不應該在應付國際責任和國內人民需要之間去作一種選擇，我們必須兩方面都兼顧，否則兩方面會落空」^②。在這種困境中，尼克森總統顯然是採兼籌並顧的政策，換言之，他的新外交政策，是繼續對盟國提供必需的援助，俾使他們在美國政策轉變過程中，能自行負擔起美國所卸下的責任，同時並設法增進他們的國家安全。

一九六九年七月廿五日，尼克森總統動身前往東南亞訪問時，在到達關島後宣佈其今後之新外交政策。他表示：「在目前這個時代，若再認為全球性的安全及發展，都依賴美國人，則既不合理，也不可能。每個國家的防禦與進步，首先應該是由他們自己的責任，其次是該區域的責任」^③。他指出美國將信守所有一切條約義務及承諾，但熱切盼望各國自行處理其國內的顛覆活動與抵禦外來的侵略，除非是受到主要核子國家威脅時，美國決不問。此外，尼克森總統還鄭重聲明，美國將不再介入類似越南的戰爭。一九七一年夏，尼克森總統又在堪薩斯市發表演講，提出其新外交政策，特別強調大國之間的協調和追求勢力的均衡，他宣稱：「我們應牢記，在世界歷史中任何一個長久的和平時期，都是當權力平衡的時候。一個國家若較其對手更有力量，危機即生。我認為如果美國、蘇俄、中共和日本都能強大健全，彼此平衡，則世界亦隨之獲得安全」^④。值得注意的是，季辛吉在尼克森政府的新外交政策的擬訂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季辛吉早在他一九五七年的博士論文內，即曾提出均勢的新觀念。在這篇論文中，他指出：「國際秩序已經承認某些原則不能因和平的緣故而妥協，穩定要奠基於力量平衡的這一原則，至少還是可以相信的」^⑤。該文主要是討論梅特涅製造平衡均勢來維持對奧國有利的國際和平。另季辛吉對俾斯麥也頗有研究，他指出後者所尋求的均勢與前者所尋求的均勢不同，他認為：「俾斯麥代表一個新紀元。均等不再被視為是和平相處或呆板式的平衡，而是在變動中，依據力量多寡，而定出統計上的平衡」^⑥。但是十九世紀所尋求的均勢，在今天的局勢中去照本宣科，是無法達成任務的

註① 同註⑤第二十七頁。

註② *New York Times*, July 26, 1969.

註③ "An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Nixon", *Time*, Jan. 3, 1972, p. 15.

註④ Virginia Brodine and Mark Selden "Henry Kissinger's Diplomacy of Force," *Open Secret: The Kissinger-Nixon Doctrine in Asi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72) pp. 21-22.

註⑤ Henry Kissinger, *Bismark: The White Revolutionary*" Cited in *James Chace, "A World Elsewhere"*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Company, 1975) p. 26.

。尼克森總統與季辛吉所尋求的均勢，祇能說近乎俾斯麥式。也就是在與意識形態不同的敵人改善關係時，美國仍須希望與昔日的盟國維持固有的友誼，美國並在均勢中取得有利地位。因為在維也納會議後的四十年期間，強國都畏懼革命；而在普法戰爭後的四十年和平期間，強國則互相畏懼。如強國互相畏懼，即可互相牽制，以造成多元的均勢，這就是「尼克森主義」的重點。

「尼克森主義」所企圖建立勢力均衡的國際關係體系，在策略應用上，具有下列三要點：(一)維持強大力量——美國必須保持「戰略足量」(Strategic Sufficiency)並選定「一個半戰爭」(1½ War)。(二)夥伴關係——美國與盟國維持夥伴關係，要求盟國先行自助，並負擔義務，分享利益。(三)談判的意願——「以談判代替對抗」，但談判必須在顧及夥伴關係與擁有強大實力的基礎上進行。仔細研究，不難發現「尼克森主義」亦有其基本的困難和矛盾。當美國跟其敵對者開展新關係時，是否能同時維持並增強舊有的同盟關係？尼克森總統自行承認這種困難，他說：「我們對中共的接近，日本即感不安，正如我們和蘇俄談判，西歐盟友亦復如此……結果，我們跟友邦的關係，在幾個月內，即因我們和對手之新關係而告失常」²⁸。因此，對「尼克森主義」中「夥伴關係」的意義，遂引起爭論，尤其是「尼克森主義」一面堅持其對各國的承諾，一面卻又盡量減少駐外軍力，而又拒絕執行「世界警察」的任務，這一切充分表示不折不扣的撤退政策。如此，則美國的承諾，決不會發生任何效果。南越的淪陷，也就是「尼克森主義」的犧牲品。蘇俄認為「尼克森主義」乃是六十年代後半期，美國處於嚴重危機中，企圖將自己的負擔轉嫁給其他盟國以圖自救的構想，此種說法似亦不無道理。

卡特當選美總統組成新政府後，布里辛斯基已成為其首席外交顧問，當然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深受布里辛斯基的影響。基本上，布里辛斯基雖亦同意均勢觀念，但却不同意僅在五個強國中去尋求，認為這樣將祇是一種幻覺。同時他認為尼克森總統的外交政策之基本架構，為一種偏於俾斯麥式的平衡，此種動態的平衡，以及注重權術的外交，自然會帶有神秘、詭異及欺詐在內，因此常使友人不與敵人不會信任。對於這類外交方式，布里辛斯基並不表同意。他具體地主張應該更注意於「第三世界」的經濟開發和援助，以及建立一種由美國、日本、歐洲三方面共同合作的親密關係，亦即建立一種「已開發國家會社」(A Community of Developed Nations)，由具有共同價值觀念的「先進工業社會組合」(The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密切合作，將有助於全球性的政治穩定。而在此一基礎上，無論是對傳統戰爭的威脅，或因貧困而招致的分裂，以及世界經濟體系(The Global Eco-system)全盤意念的崩潰、分散等等，均可以作更切合實際的反應和承擔²⁹。我們若綜合布里辛斯基的

註²⁸ Richard M. Nixon, *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Peace*,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 9.

註²⁹ Zbigniew Brzezinski "U. S. Foreign Policy: The Search for Focus," *Foreign Affairs*, Vol. 51, No. 4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July, 1973, pp. 715-724.

外交構想 不難確定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將受到下列三個原則所影響^②：(一)不重回「孤立主義」，放棄美國的意識形態，以免於其被孤立世界之外。(二)強化對「第三世界」的經濟援助，免使其經濟崩潰而帶來全球的政治危機，以及美國在未來歲月中其資源所面臨的嚴重威脅。(三)加強盟國間的合作，尤其是與工業先進國家——具有共同價值觀念的友國——間的合作。

叁

一般說來，蘇俄對美國羅斯福總統（也是對唯一的一位美國總統）曾予大力讚揚，因為他在一九三三年決定與蘇俄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實行與蘇俄在軍事及政治上澈底合作的政策。實際上，美國為當時形勢所迫，兩害相權取其輕，別無選擇地在外交政策上前後兩次分別達成了蘇俄的願望。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蘇俄當時迫切地爭取美國的承認，然而美國不僅不承認蘇維埃政權，而且還在西伯利亞及北波羅的海沿岸進行武裝干涉。事實上，在一九一七年俄共竊據政權後，美國對蘇俄一直採取經濟封鎖和外交隔離政策，主要是因為美、俄間意識形態的敵對，蘇俄拒絕償還帝俄時代的債務和歸還蘇維埃政權沒收的外人財產，以及莫斯科支持國際共黨活動使然。但到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因兩國都有擴展貿易的需要，同時也為着對抗德、日的威脅，於是在克里姆林宮承諾不支持國際共黨的活動，償還帝俄時期的債務及歸還沒收的外人財產後，美國始與蘇俄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迨一九三九年八月，因蘇俄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加之蘇俄對波羅的海各國及芬蘭進行侵略，而又使美、俄間關係轉趨緊張。隨後歐戰發生，美國為使蘇俄加入同盟國，共同對抗軸心國家，才開始積極謀求改善美俄關係。一九四二年六月，正當德軍展開第二次攻擊之際，蘇俄外長莫洛托夫於訪英後，續往美國作進一步的談判，事後，由赫爾國務卿與俄駐美大使李維諾夫簽訂特別「租借物資協定」。美國在此協定下提供之軍援物資總額，高達三十億美元。綜合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美對俄的軍、經援助，計(一)英國運交蘇俄的軍援物資，包括坦克五千輛、飛機七千架、軍火四億五千噸。(二)美國援俄軍、經物資，截至日本投降時止，共為一一二億美元，其中包括卡車三八五、〇〇〇輛、吉普車五一、〇〇〇輛、商船九五艘、曳引車八、〇〇〇輛、火車頭二、〇〇〇輛，及若干飛機、坦克、鋼軌、電力和煉油設備、大批食物等^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俄極力對外擴張，赤化東歐，並直逼巴爾幹、地中海^④，如是美總統杜魯門要求國會支援希、土，以

註^② Zbigniew Brzezinski: 1, "How the Cold War Was Played" (*Foreign Affairs*, Oct., 1972); 2, "U. S. Foreign Policy: The Search for Focus" (*Foreign Affairs*, July, 1973); 3, "America in a Hostile World" (*Foreign Policy*, Summer, 1976).

註^③ 同註^②第六二一頁。

註^④ 同註^②第六三五頁。

對抗蘇俄侵略。隨後，美施行「馬歇爾計劃」並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由於這些措施的成功，雖阻遏了蘇俄在歐洲進一步擴張，而美俄關係即正式進入對抗階段。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蘇俄搶先發射人造衛星，一九五八年又試射彈道飛彈成功，從此美俄對抗更趨激烈。嗣後，蘇俄即利用此一心理上的「優勢」來勒索美國，在一九五八年及一九六一年先後兩次發動「柏林危機」，並在一九六二年於古巴建立飛彈基地，想調整其與美國戰略武器平衡，而迫使美國在柏林問題與北約組織問題上讓步。但因美國當時仍有優勢國力（就戰略武器而言，一九六二年，蘇俄落後美國十倍）及雄厚經濟基礎，故在「古巴事件」上，終於迫使赫魯雪夫不得不在面臨世界核子戰爭的邊緣時，屈服、撤退，轉而重彈「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⑨舊調，並於一九六三年在克里姆林宮與白宮之間設置「熱線」及同年八月與美、英在莫斯科簽訂「核子禁試條約」。從此美俄對抗又進入另一個新階段。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雪夫下台，蘇俄新領導階層布里茲涅夫、柯錫金等對於外交政策確有點迷惘與舉棋不定。因懼於美國的戰略優勢（一九六五年時，蘇俄仍落後於美國四倍），蘇俄儘量抑制自己，致使美國敢於擴大越戰，並在多明尼加登陸，以阻止共黨政權的建立。尤其是在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之後，蘇俄更認為詹森政府並不是利用「和解政策」來維持國際局勢的穩定，而是用它來作為對抗蘇俄的手段。因此，在蘇俄的心目中，阿爾及利亞的班貝拉·加納的恩克魯瑪及印尼的蘇卡諾等之失勢，均由美國一手所造成。當時反俄又反美的義共機關報「團結報」曾有這樣的表示：「在維持現狀的政策及兩個超級強國企圖劃分世界勢力範圍的鬭爭中，美帝國主義逐漸採取修正過的『轉回頭』(Rollback)的老政策，在與蘇俄核子共存的架構下，進行一連串的局部干涉（經濟、政治及軍事），意圖經由建立反動政權，並加以支持，排除前進勢力，以改變世界均勢」^⑩。及至一九六七年，蘇俄所訓練和裝備的埃及部隊被以色列所擊潰，而且若干蘇俄軍事顧問亦被以色列俘虜，更使蘇俄信心受到了重大打擊，迫使蘇俄不得不特別謹慎，以防再遭挫折。

但在美國方面，其所保持的「優勢」地位，亦已面臨考驗。美自捲入越戰後，已使其原來在越南的「有限戰爭」，變成了騎虎無法下背的形勢，且耗費驚人，除佔去美國大部份國防預算外，更削弱了美國的國際地位。當捷克「自由化運動」於一九六八年春季達到最高潮後，美國既不能予以支援，更無法阻止蘇俄於同年八月武力入侵捷克。而美國在中東的外交政策，也同樣處於被動，使蘇俄得以有機會重建其在地中海原已被削弱的地位。莫斯科已開始相信在世界均勢方面，業已發生實際變化，此項變化對蘇俄及共產陣營有利，而對美國及西方陣營不利。蘇俄之所以有這種看法，係基於下列原因：（一）蘇俄和美國間的戰略能力差距已經接近（一九六八年時，蘇俄僅落後於美國兩倍），使美國不敢輕舉妄動。（二）美國本身被內部紊亂所困擾，而無力對抗蘇俄，

註⑨ 俄共（真理報），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五日。

註⑩ Alan M. Jones Jr. "U. 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David McKay Co., Inc., 1974) p. 85.

詹森總統自動放棄競選連任即為明證。(三)美國的經濟已開始走下坡，大多數的美國人民，都公開強烈反對美國對外的軍事冒險，因而使美國的對外政策陷於癱瘓。相反地，迨蘇俄以武力干涉捷克成功後，其領導階層的信心大增，「布里茲涅夫主義」之應運而生，即為此種信心增強的表示。蘇俄如是採取行動，一面促成西德布朗德政府積極推行「東進政策」，一面斷然終止美國對東歐的「搭橋」政策。他們相信，其戰略武器及傳統兵力，大致上已與美國平衡，並圖藉此改變兩個強國全球性的雙邊權力關係，以增強蘇俄在全球勢力角逐的行動自由。蘇俄認為，美國在新的世局中別無選擇地祇有重新檢討其外交與安全政策，並安排其優先順序。因此，布里茲涅夫乃將「尼克森主義」及其他有關的政策，解釋為美國在六十年代後半期，因其對外關係處於嚴重的困境中，企圖將其本身全球戰略的大部份負擔，轉移給其他國家。蘇俄並認為美國的盟友已明白地拒絕美國的建議，因為這些盟國決不願承擔更大的代價與冒險，去維護美國的利益。莫斯科的結論是：「尼克森主義」並不是什麼「負擔分配」(Burden-Sharing)，而祇是矛盾的加深，是美國國際地位更加削弱的象徵。蘇俄指出，所謂從「對抗時代走上談判時代」，即係反映出美國政府對其外交與內政上種種困難所作的調整；而尼克森總統一九七二年五月莫斯科之行，同意在「和平共存」基礎上來處理美俄關係，更可證明這種事實。至此，蘇俄領導階層對世局的信心，顯然已大增，如是他們就使用「和平共存」的幌子，來對美國進行全球性利益與影響的鬭爭，而無須冒大戰的危險。

俄共竊據政權後，其對外政策一直是以歐洲作為重點。特別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俄就以維護其在歐洲既得利益，列為優先目標。及至一九七五年赫爾辛基會議後，使蘇俄獲得名、實兼收的雙重利益，在歐洲方面的安全，已有確實保障，如是乃以其全力投注於亞洲^{註③}。蘇俄為保護其安全與利益，其最基本的手段，即為「緩衝體系」(Buffer-System)的建立。但就亞洲而言，目前它與中共之間，並無此一體系的存在。因此，蘇俄將如何箝制中共，以及不用過份激烈的手段，來使環繞中共四週的國家，採取中立而又比較親俄的態度，乃成其當前在亞洲的主要課題。自七十年代初期，蘇俄即開始塑造一種「全球主義」^{註④}。此外，由於美國與中共間趨於解凍，乃益使蘇俄在具有重大變數的中共問題上，不得不採取更為審慎的步驟，以防止美國與中共關係的改善；同時積極改善美俄關係，及採取容忍態度向中共示好^{註⑤}。蘇俄瞭解，在其全球戰略上，美國的對抗是全球性的，而中共的威脅則是區域性的。因此，就長期的利益而言，蘇俄需要先行解決區域性的問題，這樣才能以全力打擊其首要敵人。況且蘇俄

註③ Robert A. Scalapino, "Asia & The Road Ahea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162-163.

註④ Zbigniew Brzezinski, "How the Cold War was Played" *Foreign Affairs* Vol. 51, No. 1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Oct., 1972) p. 198. 布里茲涅夫認為蘇俄此一「全球主義」，其重點在歐、亞大陸，即與日本結好，孤立中共，鞏固東南亞，以及使西歐「芬蘭化」。

註⑤ Thomas W. Robinson, "Soviet Policy in East Asia", *Problem of Communism*, Vol. XXII, Nov.—Dec., 1973 (Washington D. C. Information Agency) pp. 40-41.

認為它之遭受中共威脅而被「釘在」(pinned down)亞洲，就歷史意義而言是不自然的，就政治意義而言則是被束縛而毫無價值的^⑤。至於如何容忍且不失高調的姿態來對中共示好？這可從布里茲涅夫在「俄共第廿五屆大會」的報告中找到稍許端倪。他說：「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北京回到以真正馬列主義為基礎的陣地，放棄敵視社會主義國家的方針，並站在跟社會主義國家合作與團結的道路上，那麼我們將對此作出相當的反應，是否使蘇、中(共)兩國有可能發展符合社會主義之國際主義原則的良好關係，一切取決於中國(中共)」^⑥。如果中共不接受布里茲涅夫示好的原則(事實上中共已予拒絕)，則蘇俄必須採取具體而有效的對策，那就是如何推行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布里茲涅夫於「世界共黨及工人黨大會」上所提出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計劃。其策略為：(一)積極拉攏環繞中共四週的鄰國，不論共黨國家或非共黨國家均一視同仁，先謀正常關係的建立，以經援促進雙方關係的增進，使其在中立之中而略偏蘇俄。(二)鼓吹「歐洲安全會議」的經驗，明白表示布里茲涅夫在赫爾辛基的聲明，可以適用於亞洲。「歐洲安全會議」已堅決確定，運用集體努力，並在平等及集體利益的基礎上來談判問題，乃最有效方式^⑦。而「亞洲安全體系」的目標，即在於「開創東南亞各國在雙方尊重及互利之下，建立與發展和平，合作的良好關係」^⑧。

蘇俄領導階層，既以「和平共存」政策作為其對美國的戰略基礎，因此，他們就精心設計，企圖使美國在這一政策下受到單方的束縛，進而瓦解「北約組織」，以使美國在歐洲陷於孤立；另一方面蘇俄又利用「和平共存」政策，為自己保留行動的自由，來開展其「世界革命運動」，使東、西方的均勢轉變為對蘇俄有利。為了達成上項目標，蘇俄首先必須獲得戰略優勢以束縛美國；並須迫使西方接受「和平共存」，俾能在經濟、科技方面的競爭中勝過西方國家，取得戰略優勢。莫斯科認為在蘇俄取得戰略優勢後，將會使歐洲人懷疑，美國是否願冒核戰的危險保衛歐洲。此種疑懼心理，亦是以削弱「北約組織」的功能，使西歐更易被迫接受蘇俄所提以「孤立美國、分裂德國」為目的之集體安全主張。莫斯科更認為蘇俄的軍事力量必須超過美國，因此，蘇俄對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態度，無非是在欺騙美國，使美國不從事軍備發展的新計劃，而蘇俄却可偷偷地作進一步的努力，藉以取得絕對優勢。無論是一九七二年五月莫斯科所達成的第一階段「戰略武器限制協定」及一九七九年六月維也納所達成的第二階段「戰略武器限制條約」，均無形中按蘇俄預定計劃，使莫斯科逐漸取得領先地位。

為了瓦解「北約組織」，孤立美國。蘇俄在不致發生核戰的情況下，利用各種手段，來加強共黨陣營，並同時削弱西方的勢力。在歐洲，蘇俄所採取的方式，就是用談判與協議來孤立美國，瓦解「北約組織」。蘇俄認為德國問題是歐洲問題的主要關鍵，唯有搞好與西德的關係，歐洲其他的一切問題，才可迎刃而解。對蘇俄而言，布朗德政府的「東進政策」，不僅鬆弛西德同美

⑤ Ibid., p. 41.

⑥ 俄共【莫斯科報】，一九七六年一月廿五日。

⑦ A. Sergeev, "Political Realities & Security in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ne, 1976 (Moscow), p. 44.

⑧ Ibid., p. 40.

國及「北約組織」的關係，並且還能達到永遠分裂德國的目的。同時，蘇俄還可藉以獲得西德的優良技術和貸款。一九七〇年八月，蘇俄終於跟西德在莫斯科簽訂一項「蘇、德條約」。西德正式宣佈放棄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割讓給蘇俄及波蘭的領土，並承認了奧得——奈斯河（Oder-Neisse）邊界和東、西德的疆界。至同年十二月七日，「西德、波蘭條約」在華沙簽字，更造成一片和諧的氣氛。尤其是一九七一年四國「柏林協定」簽訂後，雖然解決了西柏林的交通問題，但却迫使美、英、法三國承認了東德。這可說是蘇俄利用「和平共存」政策對西方發動「和平攻勢」的一大勝利。「北約組織」是西方對抗蘇俄集團的一個強而有力的組織，因此，在其成立之初，蘇俄即視若眼中釘、肉中刺，一直企圖予以摧毀，並設法離開該組織與美國的關係，企圖迫使美國退出歐洲。如果「北約」陷於癱瘓，蘇俄就可在歐洲肆無憚忌地擴張勢力。蘇俄之籌開「歐洲安全合作會議」，即是想在歐洲製造一種和平氣氛的假象，使西歐各國誤認有和平安全感，並無求於美國，以達到排除美國退出歐洲的目的。它召開此項會議的計劃，早在一九五四年其外長莫洛托夫在「柏林會議」中就已提出，但當時西方國家對這項會議，反應甚為冷淡。一九六六年蘇俄又在「華沙公約組織」會議中，繼續重提此項建議，至一九六九年，芬蘭政府只聲稱願意出任是項會議的地主國，並極力促成召開，不言而喻，這一切都是蘇俄幕後策動的。其後經過一九七二年籌備委員會八個月的積極籌備，第一屆「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終於在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芬京赫爾辛基正式召開。必須指出，蘇俄極力促成此項會議的圖謀有三：（一）召開此項會議，可使西歐國家產生一種安全的幻覺，公認美軍之留駐歐洲實無必要。（二）擬藉此一會議，來鞏固其對東歐附庸的控制，杜絕他們對西歐國家的私相勾搭，以解除西顧之憂，得以全力來應付在東線上與中共的糾紛。（三）欲利用這項會議，來加強吸取西方的優秀科技，並爭取西方的貸款，來解其經濟困難。

其次是蘇俄企圖填補亞洲真空以打擊美國。越戰之後，美國乃自泰國、菲律賓、韓國以及日本撤走或逐次減少駐軍。自一九七一年英政府決定撤退駐在蘇伊士運河以東地區的部隊後，英國在亞洲已不具任何影響力量。因此，亞洲地區事實上已成為民主國家世界戰略中的一個真空地帶。蘇俄之所以迫不及待倡導「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其目的無非是以先發制人的「和平攻勢」，取代美國以往在亞洲的影響與地位。依據蘇俄的看法，亞洲出現真空，中共一定乘機予以填補，因此，蘇俄必須在亞洲建立一個受蘇俄控制，並以蘇俄實力為後盾的安全體系，以便達成「圍堵中共、對抗美國」的雙重目標。早在一九五八年，蘇俄就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構想，迨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布里茲涅夫即在「世界共黨與工人黨大會」中正式宣佈：「現在國際局勢的緊張，並不妨礙我們從事一項較長期的任務，就是要在密佈着新的世界大戰即將爆發與軍事衝突不斷發生的地區內，建立集體安全體系？我們認為局勢的演進，也將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任務，在日程表上提出」^⑩。在這次大會閉幕後，莫斯科就接

註⑩ Leonid I. Brezhnev, *Following Lenin's Course: Speeches and Article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d, 1972) p. 93.

着召回其駐亞洲各國使節，討論蘇俄在亞洲的外交業務，而「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之推行，亦曾列在議程上討論，各使節並提供有關其駐在國對這個構想的反應。蘇俄推行這個構想的第一个步驟，就是爭取印度，以加強其在南亞的地位，一九七一年八月，蘇俄與印度簽訂了一項「友好合作條約」。其後，蘇俄即明白表示將繼續和其他亞洲國家簽訂同樣的條約，以實現其「亞安」的構想。然而儘管蘇俄採取低姿態，以經濟合作與貿易關係來籠絡亞洲各國，但他們絕大多數的反應，都很冷淡。

蘇俄在中東是採取「不戰不和」的政策，來與美國對抗。中東不是其新目標，不過是承襲帝俄時代的傳統政策而已。帝俄當時侵略的企圖，一在經東亞波斯灣出印度洋，尋求一個戰略上的出海口及一個溫水港的海軍基地；一在出達達尼爾海峽控制地中海，進而掌握直布羅陀出大西洋；一在掌握蘇伊士運河出紅海到達印度洋。在戰略上，如果蘇俄控制了中東、地中海及非洲北部，就構成對歐洲的側面威脅，而嚴重影響到「北約組織」地區內的戰略平衡。再從經濟觀點來看，中東石油蘊藏豐富，其目前產量亦佔全世界百分之七十左右。石油是極重要的戰略物資。西歐國家石油的主要來源，均係來自中東。如果蘇俄控制了中東的石油，就是等於控制了西歐國家的經濟命脈。在蘇俄的政策中，並不希望中東的以阿之爭獲得永久性的和平解決，果如此，美國勢力就會隨之進入這一地區。同時蘇俄也不希望阿拉伯人摧毀以色列，因為祇要以色列存在，以阿之爭就繼續存在，在這種以阿對峙的局勢下，阿拉伯國家勢必接近蘇俄，後者便可藉此增強其在前者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影響力，並進一步擴張其勢力到地中海、印度洋，造成對蘇俄有利的態勢。但是中東與歐洲情勢不同，美、俄兩國並未在此一地區內建立壁壘分明的集團或體系，相互間的均勢亦不穩定，雙方均力圖在競爭中佔據上風，而誰也不能完全操縱整個中東局勢。蘇俄在此地區的地位，純然依賴附和阿拉伯國家對抗以色列的政策始能站穩和加強，而蘇俄亦不願阿拉伯國對以輕啓戰端，因為萬一阿拉伯國家不幸戰敗，蘇俄對他們的全部軍、經援助，便將毫無所獲地付諸東流。況且蘇俄還有最大顧慮，即不願因此引起與美國的直接軍事對抗。一九六七年六月以阿第三次戰爭，蘇俄同意美國要以阿停火，實由蘇俄對阿拉伯國家施加壓力而達成。蘇俄在以阿第三次戰爭後，更積極插手中東局勢，其最顯著者為其迅速擴張地中海艦隊的船隻，並對這次戰爭中阿拉伯國家所損失的武器予以補充，此外，蘇俄更以價值一億一千萬美元的軍用物資售給伊朗，而平素由英國裝備的蘇丹部隊，亦開始接受其武器裝備。因此蘇俄在中東的勢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張。但一九七二年七月，埃及驅逐蘇俄人員出境，使其在中東的影響力受到嚴重打擊，尤其是自一九七三年十月以阿第四次戰爭後，美國領先推動以阿談判以求和平解決爭端，並分別跟埃及、敘利亞及阿爾及利亞恢復正式邦交，更使蘇俄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然而蘇俄領導階層絕不放棄任何機會，以增強其在阿拉伯國家中的影響力，它已提供廿億美元的武器予敘利亞，並於本（一九八〇）年十月與敘利亞簽訂「友好合作條約」；同時又將大批武器供給利比亞。據英國政府專家說，在過去十八個月，蘇俄及東歐集團已增加交運精密武器給利比亞，估計利比亞在這一年中，就輸入了價值一百廿億美元的軍事裝備^④；同時蘇

註④ 本（一九八〇）年十月八日新華社倫敦廿九日電。

俄更加強其與伊拉克的關係，並鼓動「巴解組織」建國。

肆

檢討美、俄兩國自第二次大戰後卅多年來的「對抗」大勢，我們所獲得的認識是：蘇俄使用「革命戰爭」或「代理戰爭」，藉「累積戰略」逐步完成了積小勝為大勝的目標，在共產主義侵略擴張下，全球已約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及將近十四億人口（約佔全世界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五），被關進鐵幕，而國際共黨的活動，仍是有增無減。反觀美國，一直在「對抗」和「和解」兩者間打圈子，我們祇看到蘇俄的勢力在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非洲及中東的擴張，而看不到美國的有效抗衡，更不見美國有效地結合盟國去「圍堵」。

自由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無論與美國近在咫尺，或遠隔重洋，無論對美國或好或惡，但彼此仍息息相關，利害與共。自由世界人民，包括我們在內，對美國所受的挫敗，亦深感切膚之痛。

美國人民從沒有像現在這般地感到在國際間受侮辱的悲痛，如是發出怒吼，選擇了一位反共的政治家來領導美國對抗蘇俄，這就是為什麼雷根以四八九張選舉人票，對卡特的四九張選舉人票，而獲得壓倒性的勝利。由於美國選民的支持，參院的多數席次亦為共和黨所獲得（共和黨五三席，民主黨四六席，其他人士一席），對於雷根政府的施政，大有裨益。

目前離雷根正式就任總統的時間，還有一個多月，我們很難詳細研究其對外政策，不過從他過去所發表的演說、競選談話、以及立場文件中，關於美、俄關係部份，可以獲得對下列幾個基本問題之原則性的體認：

(一)美國在全球所擔任的角色 美國不能規避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責任，因為美國是唯一能擔任此職的國家，所以維持和平的責任落在美國身上。如果欲順利維持和平，美國必須控制事件的發展，以制止其擴大形成危機。

(二)美國國防 美國必須扭轉軍力下降的趨勢，確保美國具有優越國防力量。美國必須根據國際、政治、經濟及軍事情勢，對國防需要立即進行全面評估，然後加速建立維持和平所需的力量。

(三)美、蘇關係 蘇俄潛伏在目前世界上每一項不安情勢的後面，如果蘇俄不玩這種骨牌遊戲，世界上就不會有緊張情勢發生，美國必須和盟國合作，對蘇俄採取一項實際及平衡的政策。美國不尋求對抗，也不尋求衝突。但為了避免對抗與衝突，美國必須保持強大，並且決心維護本身的利益。

(四)中東地區 美國必須恢復能力，對蘇俄帝國主義進一步擴張而危及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地區投入軍力。美國必須採取一項路線，使蘇俄相信，如果他們過於自信，決定介入該地區，他們就有和美國發生對抗的危險。

綜合以上對四個基本問題的體認，我們可以稱雷根政府今後所推行的對俄外交將是「實力外交」，這是蘇俄多年來加以惡毒攻擊而最害怕的美國外交政策。根據「法新社」華盛頓十一月五日電，美國總統當選人雷根最近曾這樣表示：「共和黨政府將努力早日使我們核子武力現代化，以便維持一個毫無縫隙的嚇阻網，防止各種程度的攻擊，並使歐洲盟邦對我們恢復信心」。如果要增加軍力，美國必須增加國防經費預算，那才不會徒托空言，美國已有決心向這個目標邁進。同一日(五)，另據「合衆國際社」華盛頓電，下任美國參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陶華參議員預測，美國國防預算今後將大量增加，幅度將爲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九，他說：「我們所談的是在最初一、兩年大幅增加國防預算，爲了趕上蘇俄，我們必須承受很重的負擔，因爲蘇俄加強軍力已有十五年之久」。

美國在漫長的三十年噩夢中終於覺醒了，這是美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之福！

Issues & Studies 英文月刊

「問題與研究」英文月刊 (ISSUES & STUDIES)，是一份專門研究中國共產黨及牽涉到的世界情勢的刊物，由本中心編輯出版，現已發行至第十六卷。(內容與中文版不同)。

爲使讀者從各種角度瞭解中共，該刊每期均登載：當前局勢評論、論文、原始文件、人物介紹及中國大陸大事記等。二十開本，每月下旬出版，歡迎訂閱。

售價：每冊——新台幣五十元。
美金一元五角。

訂閱：全年份——國內：新台幣五四〇元

國外：航空：美金二十四元
平寄：美金十五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郵撥帳號：三四三六號